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参考

第 3 号 (总 178 号)

2014 年 2 月 24 日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内容摘要：2013 年 12 月 1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京参加“经济学发展与中国改革”会议的佩尔·克鲁塞尔（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研究所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一行。外方代表团还包括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其他两位评委会委员托尔斯滕·佩尔松教授和约翰·哈斯勒教授，以及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新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菲利普·阿奇翁和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领军人物达龙·阿西莫格鲁。阿西莫格鲁教授的新书《为什么国家会失败》，被广泛认为是继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最有影响的经济著作。现将参加会见后阿奇翁教授和阿西莫格鲁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政策建议整理如下，仅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支柱

菲利普·阿奇翁¹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杰出经济增长表现值得世人尊敬，这使得像我这样的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在向中国提出政策建议时感到谦卑。然而，过去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追赶型增长”，即经济增长是基于模仿或适应性地改造已经存在的技术。这种增长模式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地方领导的 GDP 增长考核机制所激发，使得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从国有企业向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重新配置。同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也进一步增强了追赶型增长。

尽管追赶型增长可以通过鼓励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金融市场化改革或资本自由流动来延续，仍然有以下两个理由担心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1) 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或引进技术带来的效率增加会很快枯竭；2) 工资的增长会降低中国出口行业的比较优势。基于此，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中国怎样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从“追赶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转变；同时，怎样保证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质量？

最近的经济理论研究（包括我自己在熊彼特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以及成功的创新驱动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创新驱动型增长需要以下五个支柱：

1) 竞争和创造性破坏。与技术模仿相比，前沿创新更多依赖于竞争和准入自由。原因有两个：首先，处于科技前沿的公司，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摆脱竞争对手的威胁；其次，大部分开创性的、划时代的创新，都是由新公司完成的。由于现存的（大）企业有可能与（地方）官员合谋打击新的创新企业，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对保证竞争和准入自由至关重要。

2) 顶尖研究型大学。最近的研究表明，建设顶尖大学不仅需要教育系统加大投资，而且需要给予大学足够的自主权，包括预算管

¹ 菲利普·阿奇翁 (Philippe Aghion)，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新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

理，工资政策，雇用和解雇决定以及课程设计等方面。同时，自主权需要与大学之间以及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结合。简而言之，对于大学的这些政策改革，以竞争压力和对下负责取代了对上负责，与创新经济体中其他行业的竞争政策，道理是相通的。

3) 动态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该体系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需求方雇用和解雇的灵活性；第二，良好的再就业培训系统，帮助失业者再就业；第三，良好的社会保障系统，包括可以从一个工作携带到另一个工作，一个地区携带到另一个地区的社会保障权利，以及慷慨的失业保险系统。这样一个“灵活加保障”（flexsecurity）的体系最小化了创造性破坏的成本，使得创新驱动型经济能够全速增长。

4) 更依赖于股权投资和股权融资的金融体系。与技术模仿相比，创新风险更大，因而投资者不仅需要投资回报，更需要公司的控制权。

5) 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即在经济萧条时期，提高财政赤字，降低银行利率；而在经济繁荣时期，降低赤字，提高银行利率。创新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往往会受到信贷约束，逆周期的宏观政策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在经济周期中，保持科研创新投资水平。

那么怎样保证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质量呢？中国政府显然已经关注追赶型增长的两个副产品，即收入差距和日益恶化的环境，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质量意味着增长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落实以上五个支柱显然有助于达到这些目标：竞争政策，教育政策和“灵活加保障”的体系可以增强社会流动性；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衡能够促进竞争，同时也有助于改善环境。

以上的讨论引出另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即中国需要怎样的组织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如果需要的话），以转变为全速的创新驱动型增长？显然，我现在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不了解中国现在的制度和组织形式，以及它们在现实中怎样运行。然而，实证研究表明，“智能型国家”（smart state）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促进创新驱动型增长：1) 建立良好的财政体系，同时达到三个目标：a) 为促进创新的教育、研究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筹集资金；b) 再分配收入以避免过

度的收入差距和贫困陷阱；c) 不向创新企业征太多的税，以鼓励创新；2) 建立完善的制度机制，监督和制衡各级政府的权力，使得竞争政策得以落实，政府鼓励创新的投资用到实处。

显而易见，简单建议中国照搬现存的创新型国家的制度，以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确有些荒唐。中国需找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之路，使得上述支柱得以完全落实。我与此行的几位同事进行了沟通，我们非常有兴趣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事一起，对如下几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导向的思考：

1) 在中国现在的制度框架下，怎样设计有效的竞争政策工具和竞争机制；

2) 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需要进行哪些关于契约，组织机构和制度的改革，来落实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包容性增长的政策；

3) 怎样在现有的以 GDP 增长为基础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中，纳入环境以及包容性等因素；

4) 怎样改善中国现有的税收和福利体系，使它们达到创新驱动型国家的最高标准。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基础

达龙·阿西莫格鲁²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近七亿人脱离贫困。这一重大成就显然源于多方面的因素，我相信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经济怎样成功超越许多其他国家这一课题，将是学术界持续的研究热点。

尽管成绩斐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引擎却不难理解。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给人民提供了巨大激励和机会，将之前大大消耗和误用了的经济增长潜力释放出来。按照我与詹姆斯·罗宾逊合作的《国

² 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领军人物。

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起源》一书中的术语，中国的经济增长源于逐步朝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方向进行的改革。

然而正如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计划指出，之前的经济改革是不完全的，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进一步进行经济改革。尽管改革计划目标宏伟，并且对下一步的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我的一项研究表明，其仍然是不完整的。这个课题的主要结论，出版于《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该书着重指出，对于经济增长，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同样重要，原因如下：首先，没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可能完全包容。因为前者保证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更加平等，防止政治权力为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所垄断；其次，经济制度的持久性需要政治制度来保证，因为后者可以保证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激励以及机会沿着稳定的路径发展。

对于我们的研究，一个正常的反应是，既然中国在没有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表现惊人，那么中国经济增长也可以在同一个制度框架下成功延续。我不认为这个反应是正确的。尽管中国的增长表现为世人尊重，但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挑战将比过去三十五年复杂得多。原因在于，中国的增长发端于农业部门的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其后工业部门开始了“追赶式增长”，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而追赶式增长其实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增长模式，因为与创新驱动型增长相比，追赶式增长不需要创造新的产品和技术，而只需要通过科技引进、改造和完善现有技术，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可增长。具体到中国，比较优势显然是相对高水平的、富余而廉价的劳动力。

但是赶超之路不能永远走下去。其他赶超阶段成功国家的数据显示，当这类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世界科技前沿国家的 35-50% 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变缓，一些国家还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赶超式增长与其下一阶段的生长模式，即创新驱动型增长，主要区别在于前一个阶段可以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制度框架下发生，不需要激励个人和企业去创新，也不需要像后一个阶段那样，让市场对无效率的企业进行无情的惩罚。因而在前一个阶段，大的、甚至没有效率

的国有企业，只要有资源引进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就可以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恰恰就是这些企业，由于其低效率和政治上的联系，很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那么什么条件有助于创新驱动型增长呢？具有完全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核心，这意味着包容性即使出现一点瑕疵，也会影响创新。举例来说，微小的行业进入壁垒或影响公平的管制，会使得具有新的想法和发明的企业很难与现存的、相对低效率的以及创新程度相对低的企业去竞争。良好的创新激励环境同样很重要。在一个权力自上而下逐级递减，政治权力分布不均的社会中，社会地位的提升本质上是从现存的阶层等级体系中得到某种奖励，而这种奖励不是针对创新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创新者只能循规蹈矩，不敢打破现有秩序，大胆进行革命性的创新，而这恰恰是中国下一阶段增长的引擎。

简而言之，朝着包容性经济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小步伐的改革，对于赶超式增长可能足够了，但对于创新驱动型增长却是远远不够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中国还有时间去改革，但是剩下的这些时间必须好好利用。中国的领导宣布了雄心壮志的改革计划，同时也高度关注社会的稳定。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成功；而朝着包容性方向的政治制度改革，可以使经济制度更具包容性，同时不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为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更好的方式，也减少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当执政者的权力受到约束时，失去权力的后果就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我本人的研究，以及与我一起访问的托尔斯腾·佩尔松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增长离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越来越近，中国经济完全可以跨越这一转折点，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长轨迹，但这需要现在做出相对艰难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中心 A 座 15 层
电 话： (010) 64255855 邮 编： 100011
传 真： (010) 84080850 网 址： www.cdrf.org.cn
责任编辑： 任晶晶 电子邮箱： renjj@cdrf.org.cn
